

# 國家權力形構與華文學校課程改革 — 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個案比較\*

黃庭康

南華大學社會學所助理教授

## 摘要

本文以霸權及國家權力形構兩概念比較二次大戰後新加坡及香港政府的華文學校課程改革。二次大戰前新、港兩地的華校都採用中國國民政府的課程，散播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二次大戰後政治情況的改變迫使兩地政府改革華校課程。新加坡在戰後開始去殖民化，統治者急需建立本地為中心的身份認同，以及把華人與其他族群融合。因此政府以去華化（de-Sinicization）的手段改革華校課程，目的是消除中國為中心的思想，減低華人與其他族群的文化差異。這政策引起華人的反感。香港政府在戰後亦要改革華校課程，以減低中共及台灣國民黨政府的影響。然而因為香港是單一族群的社會，統治者沒有受到其他族群的掣肘，因此可以去國族化（denationalization）的手段把華人文化吸納並改造成有利於殖民統治。

**關鍵字：**國家理論,霸權,課程改革,新加坡,香港

---

收稿日期：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三日；接受刊登日期：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八日

\* 本文之英文版曾發表於一九九九年於加拿大多倫多舉行之「國際及比較教育學會」(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y)年會。作者感謝二位評審人的意見、歐貞延及許哲銘同學所提供之協助。

本文的目的是以霸權（hegemony）及國家權力形構（state formation）的概念比較二次大戰後新加坡及香港華文學校課程改革。義大利新馬克思主義學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霸權是建基於被壓迫者文化的宰制關係（domination）。統治者在建立霸權時非但不能打壓、消滅被統治者的文化；反之，他們必須對被統治者的文化實行吸納（incorporation），並將之重組為有助於維持現有權力關係。換言之，霸權的基礎是對被統治者在文化政策上的讓步（Bocock, 1986; Gramsci, 1971; Mouffe, 1979; Sassoon, 1987）。國家權力形構是統治階層建構統治權力的歷史過程，在這過程中，統治精英致力打造在地的（local）或國族的（national）身分認同（identity）、避免社會的分裂、贏取被統治者的同意（consent）、以及對抗挑戰國家權力的敵對力量（Green, 1990; Wong, 2002）。

許多研究國家權力（the state）與教育的學者都假設了霸權與國家權力形構是等同的（Curtis, 1988, 1992; Green, 1990）；然而，筆者認為必須把二者在概念上作清楚的劃分，因為霸權與國家權力形構的關係是受局面性的（conjunctural）歷史社會條件所影響的。其中一個中介（mediate）二者關係的重要因素是種族背景。一般而言，單一種族社會的統治者比較容易通過吸納改造被統治族群的文化形構國家權力；然而，在多元種族的社會，統治者對被統治族群的文化吸納政策可能延續種族隔離的狀況，引起其他族群的不滿，以致動搖統治權力的合法性。本文將以戰後新加坡及香港華文學校課程改革的歷史個案論證霸權與國家權力形構這錯綜複雜的關係。

與新加坡的統治者相比，二次大戰後的香港政府較能將中國文化吸納改造為霸權課程（hegemonic curriculum）。因為香港是一個大體上單一種族的、以華人為主的社會；殖民地政府在處理華人問題時不必受到其他族群的制肘。相反地，新加坡政府受制於馬來人——當地另一主要族群。為了避免觸怒馬來人，統治者不但要避免在文化上對華人做太多的讓步，甚至還受到重大壓力需要排斥華人文化。

爲了進一步釐清本文的命題，筆者在下一部份先行交代新、港兩地國家權力形構及華文學校課程的背景。

## 一、背景

二次大戰後，新加坡及香港兩地的華文學校繼續採用戰前中國大陸的學校課程及教科書。由於中國大陸的課程都是南京國民黨政府的政治宣傳的工具，它們都傳播著中國國族主義（Chinese nationalistic）及反帝國主義的思想。這對新、港兩地的殖民統治帶來衝擊（Ng-Lun and Chang, 1989; Tan, 1997）。二次大戰後的政治形勢使兩地政府決心要改革華文學校課程、減低中國的影響。在一九五零年代初期新加坡政府發表的蘭杜報告書（the Rendel Report）爲去殖民地化揭開了序幕，爲了配合獨立建國，新加坡執政者極需建立以本地人爲中心的、共同的身分認同（Yeo and Lau, 1991）。華文學校培養以中國爲中心的意識，它們被認爲是妨礙種族融合、不利於新加坡獨立建國（Gopinathan, 1974; Loh, 1975; Wilson, 1978）。

戰後不久香港亦進入了新的國家權力形構的歷史階段。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成爲中國大陸的統治者。北京政府宣揚的共產主義及中國愛國主義思想對只有一河之隔的香港構成威脅。面對這危機，殖民地掌權者需要在香港及中國大陸中間劃分清楚的界線；此外，香港政府亦必須密切的注意台灣在香港的活動，否則華人出現強烈的反共意識，香港將會淪爲兩個敵對中國政府衝突的戰場（Tsang, 1997; Wong, 2002）。

雖然新加坡及香港政府都需要控制華文學校的課程，然而因爲兩地國家權力形構計劃（projects）不盡相同，它們進行華校課程改革的目標及手法也有極大差異。在新加坡，政府需要把華人及其他族群整合成新的國族整體（national whole），因此，統治者致力減低學校課程中中國文化的比重。政府也期望藉此去華化（de-Sinicization）的政策調和當時緊張的種族關係，因爲在二次大戰時期，新加坡被日本佔領，馬來人被日本人利用執行許多打壓華人的政策，結果引起了嚴重的馬華衝突（Cheah, 1980, 1983）。根據英國人與馬來人在十九世紀

末、二十世紀初所簽訂的條約，馬來人是當地唯一的原住民。然而在去殖民化的形勢下，馬來人憂慮英國人撤退後本身的特殊地位不保，於是發動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阻止英國人在公民資格（citizenship）、語言、及教育政策對華人讓步（Amoroso, 1998; Lau, 1990; Sopiee, 1974; Yeo, 1973）。爲了避免刺激馬來人，引發更嚴重的種族衝突，新加坡的統治者必須防止華人種族身份的過度形構（over-formation）；此外，新加坡人口的華人比例接近百分之八十。一九四九年後毗鄰的兩個回教國家——馬來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a）及印尼——一直懷疑新加坡是中國共產黨在東南亞擴張的基地，這外在的種族因素進一步迫使新加坡政府難以在教育政策上對華人文化讓步。

香港的種族政治（racial politics）比新加坡簡單。由於殖民地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八都是華人，殖民地政府不太需要考慮融合華人及其他族群；統治者在處理華人問題時亦不受其他族群的制肘。此外，香港的毗鄰亦沒有與敵視華人的國家，殖民政府可以對華人作出更多的讓步。在二次大戰後最有可能在香港製造社會衝突的敵對力量是北京及台北兩個敵對的中國政府。因此，殖民地政府採取去國族化（de-nationalization）的政策改革華校課程，目的是避免華人認同中共及台灣。換言之，香港的殖民地統治者沒有消滅中國文化的意圖；它們只希望把華人文化吸納改造成有助維持殖民統治的「選擇性傳統」（selective tradition）（Williams, 1980）。

## 二、新加坡：華校課程的去華化

戰後二十年新加坡政府曾進行了多次的華校課程改革，然而，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只討論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及一九六零年代初期的兩次改革。五零年代早期新加坡還是由英國人掌權；然而到了六零年代，權力已大部分移交至由李光耀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民選政府。兩次的改革都以失敗告終。五零年代英國人的去華化政策導致華人的激烈反抗，最終迫使殖民地政府妥協；到了六零年代，人民行動黨亦無法去除華校課程的中國文化，因爲新加坡政府無法提供華校課程的替

代模式。

### 三、五零年代早期：去華化與華人的反抗

一九五零年，英國人委託芬尼（William Fenn）及吳德耀兩位教育專家研究馬來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a）及新加坡的華文學校問題。翌年，《方吳報告書》（Fenn—Wu Report）發表，建議消除外來政治對華校的影響，把華校課程改革成有助建立共同的馬來亞文化（《方吳報告書》，頁十二至十四）。報告書又建議把華校課程在地化（localize），以及把華文學校課程與其他學校——包括英校、馬來學校、及印度學校（Tamil schools）——統一起來（頁十五）。殖民政府很快便接受了報告書的建議，並委託新加坡的華人事務司（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艾健士（E. C. S. Adkins）建議具體的政策。艾健士跟當時候大部分在新加坡及馬來亞聯邦服務的殖民地官員相類似，都是對華人抱持懷疑敵視態度的。<sup>1</sup>

艾氏在一九五二年初呈交報告。之後聯邦政府成立了「教科書中央委員會」（General Textbook Committee）及「教師諮詢委員會」（Teachers Advisory Committee）進行華校課程改革。「教科書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十八名官方委員及三名教師代表；「教師諮詢委員會」的成員都是華文學校的校長及教師（《星洲日報》，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六日及十八日；林連玉，一九八八，頁三十二）。為了保證華文學校採用政府所屬意的新教科書，殖民地政府與聯營出版社簽訂條

---

<sup>1</sup> 艾健士認為解決華文教育問題的唯一方法是以英文學校取代華文學校。艾健士對中國文化的偏見並非單純是他個人的問題。當時許多在新加坡及馬來半島服務的英國殖民地官員都帶有敵視華人的傾向，因為他們把馬來人視為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本土族群（indigenous group），不願意學習華人的語言及文化。關於新、馬殖民地官員對待華人文化的態度，可參閱 Allen, 1970。關於艾健士對華校問題的立場，可參閱 Appendix B of the Report on Vernacular Publications Bureau, by E. C. S. Adkins, CO 825/90/7 and Appendix A: Chinese Textbooks, by E. C. S. Adkins, Memorandum from the Member for Education: Chinese Textbooks, Executive Council Paper, No. 3/26/52, CO 1022/285。

約。聯營出版社是當時新、馬四家最大的華文教科書出版社——中華、南洋、商務、及世界——所組成的。聯營出版社答應按照政府的指示編寫新的課本，條件是殖民地政府把聯營的教材訂為唯一的準用教科書。英國人希望聯營的教科書壟斷市場，迫使華校在別無選擇下選用依照政府指示所編寫的教材。<sup>2</sup>此外，政府又把「教師諮詢委員會」限制成純諮詢性的，以削弱華校代表對課程改革的影響（《星洲日報》，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一日及十七日）。

英國人的行動引起新、馬兩地華人的反彈，他們認為殖民政府陰謀要消滅華文學校。馬來亞聯邦最大的教師組織「華校教師會總會」率先表達不滿，他們宣稱華人有獨特的文化傳統，因此華校課程應有別於其他學校的課程（《星洲日報》，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不久，《星洲日報》的社論攻擊「教科書中央委員會」主席朋恩（E. M. F. Payne）。為了降低華校課程中國文化的比重，朋恩在較早時建議新課程應按照「由近及遠」的原則編寫，這意味著要減少關於中國的內容，增加關於新、馬兩地的比重。<sup>3</sup>《星洲日報》的社論指出所謂「遠近」可分為地理的及心理的兩個層次。由於心理上華校學生跟中國極為接近，因此新課程至少應對中國及新、馬同樣重視（《星洲日報》，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此外，華校代表又在個別科目上對政府的去華化政策展開抗爭，比方說，「公民」教科書編纂指引的初稿原本把新加坡及馬來亞聯邦稱為「國家」，又建議減少關於中國的內容。然而，經過了「教師諮詢委員會」中的「新加坡華校聯合會」代表的審查後，編纂指引改稱新、馬兩地為「地方」，又增加了關於中國的內容（《星洲日報》，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及二十一日）。

為了進一步強化反去華化的抗爭，新、馬兩地的華文教育界將矛頭指向教科書的審查程序及聯營出版社。在一九五二年四月，馬來亞聯邦的「華校教師會總會」強調「教師諮詢委員會」應對新教科書有

---

<sup>2</sup> The Draft Agreement attached to Memorandum from Member for Education on Chinese Textbooks, Executive Council Paper No 10/10/52 and Extract from Federation of Malaya, Sav. 2064, 9 October 1952, CO 1022/285.

<sup>3</sup> 關於朋恩的建議，可參閱《星洲日報》，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三及二十四日。

最後的決定權（《星洲日報》，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同時，「新加坡華校聯合會」批評政府給予聯營出版社特殊待遇。該會堅持政府應容許教科書自由出版、自由競爭（《星洲日報》，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稍後，新加坡華文學校的代表要求朋恩撤銷賦予「聯營出版社」的特權，不然政府應把其他出版社的新教科書都列為准用教科書（《星洲日報》，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同年十月，「新加坡華校聯合會」把抗議行動升級，召集了數十所華校的代表，反對政府給與聯營出版社的特權（《星洲日報》，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

面對華人的激烈反抗，殖民地政府被迫作出讓步。朋恩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底承認新的華校課程應保留中國文化。他又答應讓所有的出版社自由地出版新版教科書，唯一的條件是新的教材必須按官方頒布的課程大綱編寫（《星洲日報》，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三及二十四日）。同年十月，殖民地政府同意把教科書最後審查的工作交給「教科書聯合委員會」及「教師諮詢委員會」組成的聯席會議。這不啻是讓華校代表有更大的權力決定新教科書的內容（《星洲日報》，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到了翌年（一九五三年）年底，許多華校不理會聯營出版社已出版的新版教科書，它們依舊採用舊有的教材（《星洲日報》，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面對這情況，新加坡教育署作出妥協，承認華校有權自由選擇教科書（《星洲日報》，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新加坡殖民當局的讓步雖然平息了華人的不滿，然而卻延續了華校學校課程以中國為中心，非在地化的情況，結果是阻礙了國家權力形構的進度。

#### 四、六零年代人民行動黨的去華化政策

一九五九年五月由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成為了新加坡的執政黨。大選後英國人履行承諾，讓新加坡享有絕大部分的內部事務自主權。人民行動黨上台後向倫敦爭取完全的獨立（Yeo and Lau, 1991）。為了獨立建國的需要，新加坡的統治者必須儘快建立本地的身分認同，以及促成華人及其他族群的整合。

因此，人民行動黨須繼續去華化的政策，以切斷華人與中國的關係，減低華人與其他族群的文化差別。

一九五九年十月，人民行動黨設置了「課程及教科書委員會」，目的是釐訂新的課程大綱，鼓勵教科書的馬來亞化（Malayanization）。不久，「課程及教科書委員會」設立十四個科目委員會，成員包括來自英、華、馬、印四類學校的代表，科目委員會的任務是釐訂各科目的課程大綱（*Ministry of Education Annual Report, 1959:2*）。翌年年底新加坡教育部通過了三十三份的新課程大綱（《星洲日報》，一九六零年十月十三日及十二月十一日）。人民行動黨聲稱新課程適用於所有學校，並宣佈從一九六一年初開始全面實施新課程（《星洲日報》，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日）。

從新頒布的課程所見，李光耀政權成功地在課程大綱的層面上實行去中國化。比方說，在地理及歷史課程中跟中國或中國文化相關的課題只佔極少的比重。地理課程極度強調教授地理技術（例如：繪製地圖、測量方向等）及自然地理知識。課程中區域地理的部分涵蓋了澳大利亞、非洲、美洲、歐洲、亞洲，及新加坡與馬來半島。在新的課程大綱中「中國」只是亞洲的其中一個國家；政府不鼓勵地理教師放太多時間討論「中國」（《中小學地理課程標準》，一九六一）。歷史科的課程大綱根據世界史的方法（World history approach）編寫，它涵蓋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歷史（Wong, 1971:18-19）。因此，官方的歷史課程只容許學校花少量的時間教授中國歷史。它又把中國歷史放在世界歷史——更精確的說，西方歷史——的脈絡（《中小學歷史課程標準》，一九六一）。官方課程大綱的處理手法不單大幅度的減低「中國」的比重，它又把中國歷史及地理去中心化（de-centerize）、重新放置在西方的時間及空間的矩陣（temporal and spatial matrix）中。

人民行動黨雖然成功地把課程大綱去華化，然而新課程的執行遇上了極大的困難。首先，官方課程大綱與其後出版的教科書在內容上有極大的落差。以「世界書局」在六〇年代的華文中學歷史教科書為例。這套課本一共有六冊，其中有四冊的內容完全是關於中國歷史

的。這明顯地違背了官方課程大綱的世界史取向。此外，該套歷史教科書的第一冊第一章是「中國歷史的分期及特性」。<sup>4</sup>這種處理手法把中國歷史重新放置到中心的位置，違反了政府的去華化方針。<sup>5</sup>

人民行動黨的去華化課程在執行上遇到阻力，原因是生產華校教科書的「再脈絡化場域」(re-contextualizing fields) 帶有濃厚的中國文化背景 (Bernstein, 1996)。官方的去華化策略意味著需要去除掉執行官方課程者 (包括出版社、教師等) 的中國文化「習性」(habitus)。然而，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去掉因長期浸淫中國文化而建立的文化習性是極不容易的。以華文教科書出版社為例，它們大部分是戰前中國著名出版社的分公司，不少僱員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戰後這些出版社仍與設在其他華人社會 (例如香港) 的總公司有密切聯繫 (Carstens, 1988:75-95)。要求它們斬斷中國文化的根是不容易的。

此外，政府的去華化政策更大的阻礙來自於缺乏一個理想的文化及課程的替代模式。除了華文學校外，新加坡還有英文學校、馬來學校、及印度文學校的課程。然而，它們都不是取代華校課程的理想模式。英文學校傳統上是模仿英國學校課程的。以英校課程取代華校課程只是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觀取代以中國為中心的，無助建立本地的身分認同。以馬來學校取代華文學校亦非明智之舉，因為必然激起華人的強烈反彈。此外，在殖民統治時期英國人為了避免破壞馬來人的傳統，導致社會動盪，英國人協助開辦的馬來小學是為了準備學生繼續過傳統的農村生活，它的課程著重教導基本的寫、讀、算，以及農耕、捕魚、編織等技術。更有甚者，英國人從來沒有開辦馬來文中學。因此，馬來學校只有小學的課程；它的內容是傳統的，不適合現代國家需要的。以印度文學校課程取代華校的亦不符合新加坡建國的需要，因為它們跟隨印度的課程模式，培養印度為中心的意識

---

<sup>4</sup> 關於是套歷史課本的內容大綱，可參閱南僑女子中學創校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1967:108-110。

<sup>5</sup> 新加坡歷史學者 Wong Lin Ken 亦發現政府所頒佈的課程大綱與課本有重大落差。他指出雖然政府規定英、華、馬、印四種學校的歷史課本都按照官方的課程大綱編寫；然而內容卻出現極大的差異 (Wong, 1971:18-19)。

(Cheeseman, 1979; Gopinathan, 1974; Loh, 1974, 1975; Watson, 1993)。最後，新加坡亦不容易自行創造一個全新的，以在地為中心的共同 (common) 課程。因為新加坡剛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島上大部分居民仍與母國維持文化的聯繫。此外，在殖民統治時期各種族都生活在區隔 (segregated) 的狀況。在沒有共同歷史經驗的情況下要創造共同的本地為中心的文化以取代華校課程實在談何容易 (Wong, 2002)。

## 五、香港：華文學校課程的去國族化

從二十世紀初葉開始，香港政府就不斷的介入干預 (intervene) 華文學校。然而殖民地政府的目的只是爲了要圍堵中國政治對香港教育系統的影響 (Ng Lun, 1977; Ng Lun and Chang, 1989; Sweeting, 1990:348)。英國人在當時是無意要把華文學校課程改變成與中國大陸完全不同。因為英國殖民香港是爲了設置有助於進入中國的踏腳石，把香港的學校教育改變成完全有別於大陸有礙殖民地發揮溝通中國與西方的中間人角色 (Smith, 1985; Wong, 2002)。此外，戰前香港只有一所大學，每年取錄的學生有限；爲了方便中學畢業生回中國升學，殖民地政府有意讓兩地的課程維持一定的共同性 (Ng Lun and Chang, 1990:181; Wong, 1983:29)。

然而，戰後中國大陸政治形勢的急劇變化迫使殖民地政府改變其課程政策。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大陸的政權，香港政府馬上與一個強大統一的、仇視資本主義的及西方帝國主義的共產國家爲鄰 (Catron, 1971; Tang, 1994)。爲了圍堵中共在香港的統戰，殖民地政府必須在中、港之間劃分清楚的界線 (Wong, 2002:102-106)。此外，英國人亦必須小心翼翼的注意台北在香港的活動。因為台灣的蔣介石一直努力的爭取香港華人支持其「反攻大陸」的計劃；台北的行動有可能危害香港與北京的關係 (Catron, 1971; Tsang, 1997)。在此情況下，殖民地政府必須使香港的教育系統清楚區別於大陸及台灣，以避免學校灌輸親北京或親台北的意識形態。

## 六、去國族化的方針

一九五三年九月，香港政府成立委員會檢討中文教育的目的及方向（*Repo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ittee, 1953*：1）。委員會成員包括政府官員及教育界的重要人士。政府叮囑該會的成員必須提出有助維持香港及大英帝國親密關係的建議（p. 1）。三年前（一九四九年）香港政府曾成立一個性質類似的委員會。當時政府要求委員在政策檢討時必須考慮香港與中國的特殊關係。<sup>6</sup> 與三年前的相比，一九五二年的香港政府顯得希望本地的中文教育遠離中國的影響。一九五三年《中文教育報告書》發表。報告書指出香港學校的中國語文、中國文學、及中國歷史教育一直都緊緊追隨著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課程模式，結果培養出「高傲而偏激的中國民族主義者」（*arrogant and bigoted Chinese nationalists*）（p. 19）。爲了糾正這偏差，報告書建議割斷來自中國的不良影響。該委員會重新釐定香港中文教育的目的，指出應把重點改在培養母語溝通表達能力，以及訓練年輕人明白及欣賞中國思想、文學、及傳統（p. 17）。委員會以如下的理由支持這去國族化的教育目標：

在民主自由的社會，溝通表達是非常重要的。集權的國家以暴力強迫人民同意政府的決定，但民主社會是用講理的方式說服人民，而說服是通過話語溝通...因此，香港學校的中國語文訓練必須以訓練學生用母語表達溝通的能力為重點。這教育目標是最適合香港的.....（p. 17；原文為英文）

此外，委員會以重新定義「西方」（the West）的方式消除之前國民黨宣揚的中國國族主義。南京政府所頒布的學校課程一直把西方描述成侵略中國的敵人。然而，一九五三年的《香港中文教育報告書》卻把西方定性爲學術研究的對象。它提出中文教育有助了解中西的差異，進一步可促進雙方的和平：

<sup>6</sup>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 in Anglo-Chinese Schools, 27 August 1949, HKRS: 147, D&S: 2/2 (I).

……一旦華人學生掌握了中國的語言、文學、及歷史，他們可以進一步對東、西方的語言及思想進行比較分析。這些訓練可幫助香港的華籍青年更了解自己的語言及文化，同時又培養出自由的 (liberal)、平衡的、國際的視野。(p.19; 原文為英文)

去國族化的取向可見諸於五零年代香港殖民地的其他教育政策。比方說，一九五二年政府為本地的中文中學畢業生設置中文中學會考。香港政府在之前並沒有為中文中學舉辦學歷資格考試。在一九四九年之前許多本地中學畢業生都返回大陸參加國民政府的考試，以獲得正式的學歷資格。中共取得大陸的政權後，香港政府為了切斷本地學校與中國的聯繫而舉辦中文中學會考 (Cheng, 1954)。然而，殖民地政府並沒有意圖利用考試制度消除中國文化。舉例說，中文中學會考的規則明文規定考生必須在「中國語文」一卷取得合格，不然將不獲頒發考試合格的文憑 (《香港中文中學高中畢業會考專輯》，一九五四，頁七)。歷史及地理兩科的考試大綱容許學生將重點放在中國歷史及中國地理。<sup>7</sup> 但是，中文中學會考課程中的「中國」是屬於經過改造的「選擇性傳統」(selective tradition)；它的目的是要防止青年學生產生支持北京、支持台北、或反西方帝國主義的身分認同。舉例說，歷史科的考試範圍包括清初至一九四五年抗日勝利；它完全避過了其後的國共內戰，也沒有討論四九年後的中國。此外，民國史 (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五年) 的部分完全以國民黨為中心，忽略了該時期共產黨的重要性。最後，歷史科的課程又重新建構中國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它把五四運動定義為文學改良運動；強調東方帝國主義勢力 (例如日本及俄國) 對中國的侵略；略去了許多西方帝國主義帶來的衝突 (頁五十四)。地理科的考試大綱亦呈現去國族化的取向：它只要求選答中國區域地理的考生對中國各地的地形、氣候、物產、及城市有「概括之觀念」(頁五十六至五十七)。通過去情感化

<sup>7</sup> 香港中文中學歷史科考試分為中國歷史及世界歷史兩部份，各佔總分數的百分之五十。地理科考試分為自然地理及區域地理兩部份。區域地理部份只要求考生在(i)亞洲地理，(ii)中國地理，(iii)大英帝國及英聯邦地理三組中選擇其中一組作答。歷史及地理科的考試規則無疑容許學生們重點研習關於中國的課題。(香港中文中學高中畢業會考專輯。1954:45-57)。

(de-sentimentalizing) 的手法，殖民地政府把一個北京及台北政府鼓勵我們去愛、去為它捨身奉獻的「中國」轉化為純粹外在的認知對象<sup>8</sup>。

殖民地統治者又以分步驟的方法把學校教科書去國族化。在一九五二及五三年，香港政府公佈了准用教科書的清單。其中包括了許多台灣及南京國民黨時期出版的教科書（《文匯報》，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九日；《華僑日報》，一九五三年七月五及六日）。殖民地統治者的這一著明顯是權宜之計。在還沒有足夠的本地教科書的情況下，香港政府選擇依靠台灣及舊國民黨政府的課本，以避免學校大量採用大陸共產政權編寫的教科書。這政策亦顯示了在冷戰期間，英殖民統治者利用國民黨圍堵共產主義。然而，英國人不能過度使用這策略，不然一旦被視為縱容蔣介石在香港的活動，必然引起北京的強烈抗議（Tsang, 1997）。

殖民地統治者其後一步一步的把中文教科書在地化（localize）。他們鼓勵台灣的出版社出版「香港版」的課本，又訂定了各科目的課程大綱，鼓勵本地的出版社按照新的課程編寫教材（Wong, 2002:212-15）。最後，殖民地當局在必要時還會邀請「可靠的」人士編寫適合的教科書。例如在六零年代初期政府曾請求香港大學地理及地質學系主任戴維士教授（Professor S. G. Davis）撰寫中文中學的地理課本。在發出邀請時，政府人士再三叮囑戴氏要儘量採取中立的態度，避免得罪中共或台灣。<sup>9</sup>

香港殖民地政府的課程改革只是要求除去偏袒北京及台北的內容。它並沒有意圖要排斥中國文化及與中國有關的課題。因此，香港的出版社比較容易調整以配合政府的要求。結果，殖民地政府的去國族化政策執行得頗成功，香港的教科書與大陸及台灣的存在重大差

---

<sup>8</sup> 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指出官方課程（official curriculum）往往通過構連（articulate）學習者與課題（pedagogic topics）的情感關係（emotional connection）而建構身份認同（Bernstein, 1997）。

<sup>9</sup> Report on the Two Series of School Textbooks by Professor S. G. Davis, by K. T. Attwell, 10 September 1962, HKRS: 457, D&S: 2/10 (2).

異。這有助建立有別於兩個中國的身份認同（Chen, Wang, and Chen, 1995: 6-27）。

## 七、去國族化與反霸權（counter-hegemony）

與新加坡的去華化政策相比，香港政府的去國族化政策並沒有導致華人的文化危機感，因此沒有引發華人社會大規模的、激烈的抗爭。去國族化政策無疑導致香港的親北京及親台北人士-----兩個中國國族主義勢力-----的不滿。然而，北京及台北在香港的動員力量有限，它們發動的抗爭規模遠遠比不上新加坡華人的保衛華文教育運動。

二次大戰後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教育界的影響日益明顯；左派人士創辦學校，成立教師及學生組織，試圖影響香港年輕人的思想。在國共內戰期間親共的教師批評國民黨的教育政策，指稱南京政府的課程把年輕人培養成保守、馴服的奴才（《中小學民主教育的探索》，一九四九年，頁一九五至二四九）。一九四九年共產黨贏取了內戰的勝利，教育界左派人士馬上呼籲全香港的學校都採用新中國政府編寫的教科書（《文匯報》，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六日）。兩年後，香港政府籌備成立香港中文中學會考，漢華、新僑、中華、培僑等左派學校馬上公開宣告杯葛殖民地政府的該項考試（《文匯報》，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及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及十四日）。左派的教育界人士又通過親北京的報章發動攻擊、批評中文中學會考的課程內容「扼殺學生的思想」、「灌輸殖民地意識」、「矇蔽年青人，使他們不自覺是新中國的未來主人」、以及妨礙學生們認識「中國人民革命的光榮歷史」及「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所取得的光榮成就」（《文匯報》，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及三月十一日及十七日）。

雖然親北京人士的反霸權抗爭直接針對殖民地政府的去國族化政策；然而，香港左派動員力量有限，限制了抗爭運動的進一步擴大。首先，香港的親共教育界人士大體上採取自我封閉式的防衛性策略，

它們極少主動的爭取其他學校加入、擴大反對殖民地政府課程改革的抗爭 (Wong, 2002:218)。此外，由於缺乏財政資源，左派學校在香港的學生人數有限。根據嘉創 (Gray Catron) 的估計，一九五零年代中葉香港中、小學的總在學人數是二十五萬，其中只有一萬至一萬二千人 (少於百分之五) 就讀於左派學校 (Catron, 1971:147)。左派教育界人士的策略相對而言缺乏攻擊性，部分原因也許是要配合北京的香港政策。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直重視保持香港殖民地現狀所帶來的經濟及政治利益，因此對英國人在香港的統治基本上採取容忍克制的態度 (Catron, 1971; Chan, 1998; Heaton, 1970; Tang, 1994)。

香港有兩類型的親國民黨學校。在九龍半島東部調景嶺的學校是極端國族主義 (ultra-nationalistic) 的，它們強烈地支持台北國民黨政府。這些學校大都在五零年代早期在香港政府、台北、美國援助中國知識份子協會、及其他國際宗教及文化組織的支持下成立 (Wong, 2002:218)。<sup>10</sup> 它們向台灣政府立案，採用中華民國教育部的課程及教科書。此外，調景嶺的親台學校沒有向殖民地當局立案，又拒絕讓學生參加香港政府舉辦的公開考試。它們不少學生都在畢業後到台灣升學 (《領中三十五年》，一九八五年，頁六至七；《鳴遠青年特刊》，一九九零年，頁一)。這些學校以教導三民主義，培養青年人愛國反共思想為目的。<sup>11</sup> 然而，在一九五零年代末期，調景嶺九所學校的學生總數是三千五百六十人，只佔全香港學生總數 (三十七萬) 的不到百分之一。<sup>12</sup> 因此它們對香港政府去國族化課程政策的挑戰是有限的。

除了在調景嶺的少數極端親國民黨學校，香港還有為數較多的其

---

<sup>10</sup> 一九五零年六月親北京的工會人士與國民黨支持者在香港島的摩星嶺發生嚴重的衝突。事後香港政府在偏遠的調景嶺設置難民營安置從大陸逃出來的國民黨老兵。然而，為了避免中共的反感，殖民地政府很快便抽身而出，儘量避免介入調景嶺的事務。關於一九五零年六月國共雙方支持者在香港的衝突，可參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 June 1950。

<sup>11</sup> 關於調景嶺親台學校的背景，教育目標及課程，可參閱(1959-1960)香港調景嶺設置難民營調查報告。頁六十至八十八。

<sup>12</sup> *Report of Education Commission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3)*, p. 14 及香港調景嶺設置難民營調查報告。頁三十八至三十九。

他親台學校。然而，這些學校都是傾向於向殖民地現實情況妥協的。舉例說，德明學校是全香港規模最大的「右派學校」，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學年，它的幼稚院、小學、及中學部學生人數是七千六百多人，遠遠超過了調景嶺九所學校學生的總數。德明學校宣稱的教育目標是「支持自由中國的國家發展」、「培養未來國家棟樑」、及「發揚優良的傳統中國文化」。此外，德明中學每年都有相當數量的畢業生到台灣升學。然而，德明是願意在課程內容上與殖民地政府配合的。因為它保送學生參加香港政府舉辦的公開考試，採用台灣及香港教育當局都能接受的課本。因此，德明對香港政府課程政策的立場是溫和的。<sup>13</sup>

## 八、總結

本文的目的是要提出兩個命題-----其中一個是理論性的，另一個是歷史的。首先，本文試圖論證國家把族群文化吸納改造成霸權課程的能力（capacity）是受族群關係所影響的。其次，香港的統治者較新加坡政府能夠把中國文化吸納改造成有利於維持既有的統治權力。原因是香港是單一種族的社會；但新加坡卻是多元種族的。新加坡政府倘若在課程政策上對中國文化進行吸納讓步，勢必導致馬來人的不滿，延續原來種族不融合的局面，最後破壞了國家權力形構的計劃。

本文所引用的兩個歷史個案亦有助我們重新思考霸權與國家權力形構的關係。首先，它們顯示出相同的文化吸納策略可能在不同的歷史社會脈絡中對國家權力形構帶來不同的效果。在香港，對華人進行文化的吸納與讓步無疑有助鞏固殖民地統治。但在新加坡，相同的策略極有可能激化種族矛盾，導致統治權力的不穩定。是項研究發現充分顯示「霸權」及「國家權力形構」兩概念是應被清楚區別的。我們應該進一步的釐清各種霸權策略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中對國家權力

---

<sup>13</sup>德明校刊。香港：德明學校編。一九五零及六零年代各期。

形構的影響。這方面的努力是有重要意義的。因為目前許多教育社會學學者都錯誤地把「霸權」及「國家權力形構」在概念上等同起來（Green, 1990; Curtis, 1988, 1992），結果矇蔽了我們，使我們不容易察覺霸權策略在具體的社會歷史情境中可能導致的矛盾效果。

## 參考文獻

### 官方出版文獻

新加坡教育部(1961)中小學地理課程標準。

新加坡教育部(1961)中小學歷史課程標準。

Kuala(1951) *Chinese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Malaysians: The Report of a Mission Invited by the Federation Government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Education of Chinese in Malaya* [方吳報告書]  
Lumpur: Government Printer.

Ministry of Education(1959)*Annual Report*, Singapore.

Repo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ittee(1953)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Report of Education Commission( 1963)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 官方機密檔案

Appendix B of the Report on Vernacular Publications Bureau, by E. C. S. Adkins, CO 825/90/7 and Appendix A: Chinese Textbooks, by E. C. S. Adkins, Memorandum from the Member for Education: Chinese Textbooks, Executive Council Paper, No. 3/26/52, CO 1022/285.

The Draft Agreement attached to Memorandum from Member for Education on Chinese Textbooks, Executive Council Paper No 10/10/52 and Extract from Federation of Malaya, Sav. 2064, 9 October 1952. Both in CO 1022/285.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 in Anglo-Chinese Schools, 27 August 1949, HKRS: 147, D&S: 2/2 (I).

Report on the Two Series of School Textbooks by Professor S. G. Davis, by K. T. Attwell, 10 September 1962, HKRS: 457, D&S: 2/10 (2).

### 報章

星洲日報，新加坡。

華僑日報，香港。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華早報》)，香港。

## 書籍及期刊文章

- 林連玉(1988)風雨十八年，上集。吉隆坡：林連玉基金委員會。
- Albert ,Lau.(1990).*The Malayan Union Controversy: 1942-1948*.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len ,J. de Vere (1970).“Malayan Civil Service, 1874-1941: Colonial Bureaucracy/Malayan Eli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2:149-87.
- Amoroso, Donna. (1998).“Dangerous Politics and the Malay Nationalist Movement, 1945-47,”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6(3):253-80.
- Andy Green(1990).*Educ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The Rise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England, France, and the US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Bernstein ,Basil (1996).*Pedagogy, Symbolic Control and Identity: Theory, Research, Critique*.London:Taylor and Francis.
- Bernstein, Basil. (1997).“Official Knowledge and Pedagogic Identity,” In Nilsson Ingrid and Lundahl L.(eds.)*Teachers, Curriculum and Policy: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Pp. 165-79. Sweden:Printing Office, Umea University,.
- Bruce Curtis(1988).*Building the Educational State: Canada West, 1836-1871* .Philadelphia, PA:Falmer Press.
- Bruce Curtis(1992).*True Government by Choice Men? Inspection, Educ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Canada West* .Toronto,Ontario: University of Toronto.
- Catron, Gary. (1971) .*China and Hong Kong, 1945-67*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 Chai-Lok, Wong. (1983).*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n Chinese] .Hong Kong: Po Wen Book Company.
- Cheeseman,H. R. (1979).“Education in Malaya, 1900-1941,” *Malaysia in History*, 22:126-37.
- Cheuk-Wah, Chan (1998).“Hong Kong and Its Strategic Values for China and Britain (1949-1968),”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8( 3): 346-65.
- Gopinathan, Saravanan. (1974).*Towards a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 in Singapore, 1945-1973*.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Heaton, William. (1970). "Maoist Revolutionary Strategy and Modern Colonialis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 10( 9):840-57.
- Jackie Chen, Anna Wang, and Elaine Chen(1995). "Opening a 'window' on Ideology: A Comparison of School Textbooks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Sinorama* 20(6):6-27.
- James, T. H. Tang(1994). "World War to Cold War: Hong Kong's Future and Anglo-Chinese Interactions, 1941-55." In Ming K. Chan(eds.)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1842-1992*. Pp. 107-29.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Kheng, Cheah Boon.(1981). "Sino-Malay Conflicts in Malaya, 1945-1946: Communist Vendetta and Islamic Resistanc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2( 1):108-117.
- Kheng, Cheah Boon.(1983).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1-1946*. (2nd edition)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Lin Ken, Wong. (1971). "The New History Primary Syllabus: Purpose and Scope,"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Pp. 16-21.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istorical Society.
- Liok Ee, Tan. (1997).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1945-6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hamed, Noordin Sopiee.(1974). *From Malayan Union to Singapore Separation: Political Unification in the Malaysia Region, 1945-65*. Kuala Lumpur: Penerbit Universiti Malaya.
- Mouffe, Chantal. (1979). "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 In Chantal Mouffe(eds.)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Ngai-Ha Ng Lun. and Chak-Yan, Chang. (1989).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n Chinese] In Ng Lun Ngai-Ha and Chang Chak-Yan(eds.) *Overseas Chinese in*

- Asia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 .Hong Kong: Overseas Chinese Archiv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Ngai-Ha,Ng Lun(1977).“Consolid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School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4(1): 159-81.
- Philip Fook Seng Loh(1975).*Seeds of Separatism: Educational Policy in Malaya 1874-1940*.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hilip, Loh.(1974).“British Policies and Education of Malays,” *Paedagogica Historica* 14( 2): 355-84.
- Robert Bocock(1986).*Hegemony* .London and New York:Tavistock Publications.
- Sassoon, Anne Showstack. (1987).*Gramsc’s Politics*(2nd edition) .London: Hutchison.
- Sharon A. Carstens(1988).“Chinese Publica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n Jennifer Cushman and Gungwu Wang(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Pp. 75-95.Hong Kong: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Steve Yui-sang, Tsang.(1997).“Strategy for Survival: The Cold War and Hong Kong’s Policy Towards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the 1950s,”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5( 2): 294-317.
- Sweeting ,Anthony. (1990).*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T. C. Cheng(1954).“The Hong Kong Chinese 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o. 12 .
- Ting-Hong, Wong(2002). *Hegemonies Compared: State Formation and Chinese School Politic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 Wah Yeo, Kim .(1973)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1945-5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Wah Yeo, Kim and Albert ,Lau(1991). “From Colonialism to Independence, 1945-1965.”In Ernest C. T. Chew and Edwin

- Lee(eds.) *A History of Singapore*. Pp. 117-53. Singapore: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tson ,Keith. (1993).“Rulers and Ruled: Racial Perceptions, Curriculum, and Schooling in Colonial Malaya and Singapore.” In J. A. Mangan(eds.) *The Imperial Curriculum: Racial Images and Education in the British Colonial Experience* .Pp. 147-74.London and New York.
- Williams,Raymond. (1980).“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e Theory,” In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Selected Essays* . Pp. 31-49 .London: Verso.
- Wilson, Harold E.(1978). *Social Engineering in Singapore: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Social Change, 1819-1972*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Yeo Kim ,Wah. and Albert Lau(1991)“From Colonialism to Independence, 1945-1965,” In Ernest C. T. Chew and Edwin Lee (eds.)*A History of Singapore*. Pp. 117-53.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其他

- (1949)中小學民主教育的探索：香島中學後復校三年經驗總結。香港：香島中學後復校三年紀念冊編輯委員會。
- (1954)香港中文中學高中畢業會考專輯。香港：開羅出版社。
- (1959-1960)香港調景嶺設置難民營調查報告。香港：大專社會問題研究社。
- (1967)南僑女子中學創校二十週年紀念特刊。新加坡：南僑中學。
- (1990)鳴遠青年特刊。香港：鳴遠中學班聯會暨中文學會。
- (1985)嶺中三十五年。香港：調景嶺中學校刊編輯委員會。
- (1990)鳴遠青年特刊。香港：鳴遠中學班聯會暨中文學會。
- 德明校刊。香港：德明學校編。一九五零到六零年代各期

# **State Formation and Hegemonizing Chinese School Curricula i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1945 to 1965**

**Ting-Hong Wong**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n-hwa University

## **Abstract**

Using the concepts of hegemony and state formation, this paper compares Chinese school curriculum reform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Before WWII, Chinese schools in both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followed the curriculum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China and spread China-centered worldview. After the war, Singapore launched the process of decolonization, the ruling regime sought to construct a Singapore-oriented identity and integrate the local Chinese with other ethnic communities. As a result, the government was eager to dilute the cultural distinctive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t reformed curriculum of Chinese school by the strategy of de-Sinicization. This approach, perceived as a conspiracy to destroy Chinese culture, provoked tough opposition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postwar Hong Kong, ruling elites of the colonial regime wished to curb the influences from Beijing and Taipei—two rival Chinese governments—on Chinese schools in local setting. However, as Hong Kong was basically a monoracial Chinese society, a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were not circumscribed by pressure from other racial group. As a result, the government reformed Chinese schools by the strategy of de-nationalization, which means incorporating Chinese culture as part of the official curriculum and remaking it into a form that helps consolidate colonial rule.

Keywords : state theory, hegemony, curriculum reform, Singapore, Hong kong